

0180

60711/19...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 学 术 讨 论 会



论我党在国际共运中处理党际 关系的历史经验

李 忠 杰

中共中央党校科社教研部

1991年7月

内 容 提 要

对外党际关系是党的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前形势下具有特殊意义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将党的活动与国际共运的宏观背景联系起来，系统考察了我党对外党际关系的发展过程，概括分析了处理党际关系的基本经验，在此基础上，根据当前形势特点，提出了若干对策性建议。

全文共三部分。第一部分“党际关系发展的曲折历程”，描述了70年来我党对外党际关系发展的基本脉络，划分两个时期七个阶段，分析了每个时期的特点和各个阶段的主要状况，简要评述了成就和失误。

第二部分“处理党际关系的经验教训”，概括了我党在国际共运中处理党际关系的五条历史经验：一、正确对待外国经验，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二、正确处理国际联合与国内事务的关系，着重把国内的事情办好；三、坚持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积极发展同各国党的关系；四、正确处理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相交织的复杂现象，用不同的原则和方式处理不同领域的问题；五、正确处理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分歧。

第三部分“总结历史经验，处理好当前党际关系”，分析了当前国际共运形势的五个特点，提出了新形势下处理党际关系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论我党在国际共运中处理党际关系的历史经验

中央党校科社教研部 李忠杰

中国共产党的70年，是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而载入史册的。中国共产党在其活动过程中，不断地与世界各国的共产主义政党或其他类型的进步政党发生着交往、联络或合作关系。因此，如何处理与其他国家党的关系，构成党的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党的建设所不断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党际关系的状况以及如何处理党际关系问题，不仅关系着整个国际共运的面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我们党自身的活动和发展。70年来，我们党在处理国际共运中党际关系问题上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近年来，由于东欧剧变和其他原因，国际共运的整体态势和内部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如何适应新的形势处理和发展党际关系，成为一个重要的战略和策略问题。因此，正确地总结我党在处理党际关系上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创造尽可能良好的外部环境，更好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时推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党际关系发展的曲折历程

70年来，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我党的对外党际关系有不同的情况和特点。为寻求正确的处理党际关系的原则和形式、方法，我们党走过了曲折的道路。

从1921年到1949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党在国际共运中所处环境、地位及党际关系的特点是：

第一，我们党的基本任务是夺取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因此，党际关系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处理好中国革命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争取各国共产主义政党在革命斗争中相互支持、相互帮助。

第二，由于我们党尚未取得执政地位，所以对外主要是处理和发展党际关系，还没有以执政党的身份直接处理国家关系问题，也还没有直接面对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相交织而带来的一系列复杂情况。

第三，1943年前，我们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成员，组织上政治上受共产国际领导（1935后情况有较大变化）。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党的对外关系基本上处在以共产国际为指导中心的世界共产主义政党体系的框架之内，并受到这种框架的制约。

第四，为处理好党际关系，我们党经历了艰难曲折的探索过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终于确立了实事求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等重要原则，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这是在处理党际关系方面取得的最大成就。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党的对外党际关系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21年至1927年初。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并加入共产国际。由于西方革命的退潮，东方革命成为共产国际世界革命的战略重点。中国共产党积极发展与共产国际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联系，并在其帮助下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掀起了大革命高潮，推进了北伐战争。同时，党在组织上和思想理论上也越来越受制于共产国际。党际关系上的偏差是造成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

第二个阶段，从1927年至1935年初。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更加紧密，并与其他国家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互相支持，特别是注意学习苏联的革命经验。但同时也受到共产国际频繁和过度的干涉，独立自主性严重削弱，以致先后发生三次严重的“左”倾错误。毛泽东同志从中国实际出发，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新道路。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不仅使中国革命出现历史性的飞跃，也使我们党的对外党际关系走向了新阶段。

第三个阶段，从1935年至1943年。我党虽仍属共产国际，但自主性已大为增强。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我党基本上独立地决定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把革命和抗战的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并通过延安整风，解决了思想路线问题。我们党与外部世界的联系逐步扩大。中国的抗日战争得到其他国家共产党和人民的支持，我们党也声援、支持和配合了苏联、西班牙等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

第四个阶段，从1943年至1949年。随着共产国际的解散，我们党隶属于一个国际组织并在党际关系方面受之制约的状况完全结束。在新的条件下，我们党完全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先后取得了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苏联党和红军对我抗日战争的胜利及其之后革命力量的发展提供了很大帮助。欧亚人民民主国家相继建立并互相声援。这些国家共产党、包括中国党在内，开始遇到在原有党际关系基础上如何处理国家关系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我们党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党对外党际关系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党际关系的主要特点是：

第一，随着党的历史任务、工作中心的转移，我们在党际关系方面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有所变化。我们不仅要与各国党在革命斗争中互相声援、支持，还要与一些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彼此交往、相互合作；不仅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支持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还要坚持国际关系的正确原则，创造有利于国家发展的外部环境，争取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促进人类的进步与发展。我们的任务不仅更艰巨了，而且更复杂了。

第二，我们党已取得执政地位，所以，我们在对外关系方面，不仅要考虑党的利益与党的关系，而且要考虑国家利益和国家关系。我们所面对的，既有执掌国家政权的共产党，又有处于在野或地下状态的共产党；既有保持友好关系国家中的党，又有尚无外交关系国家中的党；既有意识形态上完全一致的党，又有存在不同观点乃至分歧的党。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的交错融合，使我们遇到了许多新的复杂的问题。

第三，建国40多年来，我们党的对外交往关系逐步扩大，不仅发展了相同社会制度国家共产党的关系，而且发展了不同制度国家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不仅发展了国际共运内部的党际关系，而且广泛发展了同其他类型友好、进步政党的关系。迄今，中国共产党已经同世界上280多个政党建立了不同形式的联系。因此，我们的党际关系取得了一种全方位的态势和特点。

第四，40多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一方面注意学习外国党的经验，

扩大交往和合作，另一方面反对外来干涉与控制，坚持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在如何具体处理不同条件下党际关系的复杂问题时，在寻求科学的党际关系指导原则的道路上，也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多多少少有过失误。通过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我们党在处理党际关系方面已经比较地成熟起来。

从1949年建国至今，我们党的对外党际关系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49年至50年代末。我们党积极发展对外交往和合作关系，与全世界共产党一起，推进国际共运、工运以及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特别是支持亚非拉人民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由于客观上存在着一个与帝国主义阵营相对抗的社会主义阵营，我们的党际关系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以阵营关系为主体，再包含阵营之外党的多层次结构。我们既维护过阵营关系，也受到过阵营关系的制约。我们发展了与苏联党和国家的全面合作，既照搬了苏联体制的模式和经验，也在某些方面进行了独立的探索。由于一系列复杂的原因，我们党先后与南斯拉夫和苏联等党出现意识形态上的分歧。

第二个阶段，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后期。中国党与苏联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进一步发展，乃至公开展开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大论战。苏共的大党大国主义受到强有力的冲击，我们党也不再奉行一边倒的政策。但大论战客观上造成了国际共运的大分裂，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随后，我国又发生“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社会主义国家相互间的关系也愈益紧张。我们党同大多数外国党的联系都中断了。

第三个阶段，粉碎“四人帮”和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对外工作方针进行了重大调整，并提出了处理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我们党逐步同60年代中断关系的外国共产党恢复了关系，同第三世界友好政党、以及同各国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建立了联系。特别是与苏联共产党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中国党与外国党之间，开展了比过去范围更加广泛、内容更加丰富充实、形式更加多样化的友好往来，使我党的对外党际关系出现了崭新的局面。

二、处理党际关系的经验教训

70年来我们党所走过的曲折道路，提供了大量有关处理党际关系的经验教训。这些经验教训，是我们党历史宝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不可忘记和忽视的宝贵思想财富。

第一，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外国经验，坚持从实际出发，根据本国特点，走自己的革命道路，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70年来，我们党在党际关系上遇到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从外国经验和模式出发还是从本国实际出发来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问题。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建设，都有各自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科学的思想方法要求我们正确处理共性与个性、个性与个性的关系，不仅要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实际结合起来，而且要善于从本国的实际出发来学习和运用外国的经验。我们党在建立之初，并不十分清楚这一道理，因而曾经简单地照搬苏联的经验，被动地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建国后，在经济、政治体制上，也曾经照搬了苏联模式。这种照抄照搬的后果，一次又一次地教训了我们。正是在总结这些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同志提出并坚持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原则，领导我们党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一条独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邓小平同志又总结我们党数十年的探索过程，深刻地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

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①

当然，这一结论不仅是对我们自己的要求，也应该是用于对待别人的原则。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我们应该允许别人从自己的国情出发决定自己的政策，不能把中国的经验和认识也当作普遍适用的原则和模式强加于别人。过去，我们在这方面也有过失误，例如，曾经把南斯拉夫依据本国国情实行的自治社会主义，当作现代修正主义的典型，指责南共联盟背叛马列主义。这种做法，如同别人这样对待我们一样，都是错误的和有害的。

第二，正确处理国际联合与国内事务的关系，把重点放在本国的革命和建设上，自力更生、扎扎实实地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并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同时又指出：“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②，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应把基点放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

我们党对这两者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将他国利益误认为世界革命整体利益，进而置于中国革命利益之上的情况。例如1929年时，曾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当然，从总体上看，特别是毛泽东掌握领导权后，我们党基本上正确处理了两者关系，能够坚持自力更生的原则，把重点放在解决本国革命和建设的问题上。

作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我们同其他国家共产党一样，都负有支援世界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责任。但是，如何理解和承担这种责任，却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过去，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曾经把中国看作世界革命的根据地，试图通过大量支持和援助外国共产党人达到推进世界革命的目的。但实践证明，在世界范围内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自然历史过程，它不是靠某个党某个国家的主观愿望和力量所能实现的。革命不能人为鼓动和加速，社会主义也不能通过对外输出去实现。超越自身力量的限度，去追求一些超越现实的目标，承揽一种力所不及的责任，这种做法，于己于人，都未必有益。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只有扎扎实实把自己的改革开放搞好了，把社会主义现代化搞好了，我们才能在世界人民面前树立起社会主义的良好形象，也才能在世界上有较大的发言权。当然，这并不是说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命运无动于衷。关键要象“画龙点睛”一样，在适当的时机，以适当的方式，发挥适当的影响。

第三，坚持“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积极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及其他各种进步和友好政党的关系。

独立自主不等于排斥一切对外联系、交往和合作。如果说，我们党在历史上较为注重独立自主的话，那么，对于对外开放必要性的认识及这一政策的实行，却较为迟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较好地将这两者结合了起来。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外关系上，要注意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妄自菲薄，崇洋媚外，丧失独立自主的地位。另一种是夜郎自大，闭关锁国，忽视对外交流和开放，人为地将自己孤立起来。

实行对外开放，既需要通过政府渠道，也应该充分发挥政党渠道的作用。积极发展对

^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4、286、262页。

外党际关系，对于争取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并推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发展党际关系要以正确的原则作指导。我们党的十二大提出发展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这是对国际共运和我们党自身历史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总结，是我国独立自主对外关系总原则在对外党际关系领域的贯彻和体现。所谓独立自主，就是完全根据自己的认识和判断，在将马克思主义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完全由自己决定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内的一切事务，并向本国人民负责，同时，依靠自己的力量走向或建设社会主义，决不仰人鼻息。所谓完全平等，就是不论大党还是小党、老党还是新党、执政党还是非执政党，都没有尊卑贵贱之分，不能由一个党充当领导和旗手角色，对别的党发号施令，不能由一个党垄断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和发展权，更不能把一个党的纲领、路线、政策和观点，当做共同的原则强加给其他党。所谓互相尊重，就是承认任何党都有自己的主权和尊严，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长处和短处，成就和失误，因此，各党应彼此尊重，平等相待，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所谓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就是各国党的内部事务，必须由各国党自己去处理，任何其他党都无权干涉。即使对犯了错误的党，也不能指手划脚，随便干预和讨伐。任何企图对别国党进行渗透、干预、控制乃至颠覆的活动，都应该受到谴责。党际关系的这四项原则，不仅适用于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也适用于共产党同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工党之间的关系。

第四，正确处理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相交织的复杂现象，用不同的原则和方式解决不同领域的问题，以党际关系促进国家关系。

取得政权前，我们的对外关系主要是基于共同阶级利益的政党关系。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我们不仅要发展党际关系，而且要积极发展和处理国家关系。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相互交织，由此而提出了一系列需要回答的新课题。

首先是阶级共同性与国家利益关系问题。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我们既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又是整个国家的管理者和领导者。因此，我们在处理与其他党、其他国家的关系时，不仅要注意各国党之间共同的阶级性质，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且要注意代表和维护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坚持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要把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结合起来。这是我们发展对外关系的基本出发点。

如何处理同是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相互间的关系，这也是一个新课题。社会主义国家间，存在着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两类关系。这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差别，不能简单等同。早在1953年12月，我们就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在很长时间内，主要还是把它运用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而对相同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则主要是强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相互支持和相互援助的原则，随着社会主义国家同一些悲剧性事件的发生，我们越来越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间首先必须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如果连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都做不到，那就根本谈不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所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是不同制度国家间，而且也是相同制度国家间相互关系的准则。

党际关系和国际关系分属于不同的领域，但党际关系又是国家对外活动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应该通过发展党际关系为国际关系服务，促进国际关系的发展。由于党际交往的形式更加方便、灵活，且不受某些特殊条件的限制，因而能够起到国家交往所不能起的某些作用。几十年来，我们积极发展党际关系，为我国的对外友好关系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第五，正确处理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分歧，坚持实事求是、平等协商、求同存异、不计前嫌的原则，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谋求相互间的了解与合作。

国际共运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过意识形态上的严重分歧和冲突。毋庸讳言，我们在处理这些分歧时，确实犯过错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终于比较妥善地解决了历史遗留的问题。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多样性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特点之一，各国党在意识形态上的绝对同一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承认、尊重这种多样性，而决不可能消除这种多样性。只能在多样性的基础上寻求统一性，而决不可能用统一性来限制、消灭多样性。因此，对于各国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和分歧，我们不必有任何的大惊小怪。

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我们有自己的原则立场。我们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凡是我们认为符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的，我们都要坚持；反之，都要加以拒绝和抵制，在某些情况下，还要采取措施清除外来的影响，这就是我们在原则上的坚定性，也是被历史证明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

另一方面，这种政治立场上的原则性，并不排斥党际关系上的原则性。处理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必须坚持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尊重别党自己的选择，不干涉别党的内政。在此基础上，还应注意做到实事求是，平等协商，求同存异，不计前嫌。这也是我党多年积累起来的经验。

实事求是，就是要尊重事实，准确理解对方的立场和观点，不要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上纲上线，无限拔高。要从对方实际出发来判断其政策是否符合他们的实际，而不要从我们的经验出发来要求对方。正如邓小平指出的：“一个党评论外国兄弟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就算你用的公式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各国的实际相结合，也难免犯错误。”^①

平等协商，就是要以平等的立场和态度，进行讨论和协商，增进了解，消除误会，交换意见，沟通思想。切不可动辄论战、批判，更不能以辱骂代替战斗，甚至以开除出阵营或使用武力相威胁。

求同存异，就是要正确判定敌我友关系，尽量寻找双方的共同点并促进在这些共同点上的团结合作。要允许各党保留意见。原则上，任何分歧都可以留待实践和历史去作结论，而不必彼此争论不休。即使讨论分歧点，也是为了消除分歧而不是扩大差异，是为了寻求合作而不是增强对抗，是为了将同志或盟友拉过来，而不是将同志或盟友推过去。

不计前嫌，用邓小平同志的形象说法，就是对以往的分歧和矛盾采取“一风吹”的方法，把着眼点放在现在的团结和未来的发展上，即团结一致向前看。

总之，处理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既要坚持原则上的坚定性，又要注意策略上的灵活性；既要坚持政治观点上的原则，又要坚持党际关系上的原则。这是我们在党际关系方面的重要经验。

三、总结历史经验，处理好当前党际关系

近年来，由于一系列复杂的原因，国际共运的整体态势和内部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出现了二次大战以来从未有过的复杂而严峻的局面。

^①《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8页。

第一，由于东欧发生剧变，苏联陷于困境，以及其他党和国家也面临不同程度的困难，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确实遇到了严重的挫折。社会主义的世界体系客观上受到削弱，在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并存对峙的战略格局中，滑到了较为不利的地位。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暂时受到阻滞。

第二，国际共运的内部关系发生分化、改组。东欧一些国家的原共产党奉行民主社会主义后，与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政党拉大了距离，它们相互间严格说来已不是传统意义上国际共运内部共产主义政党之间的关系。但是，在这些国家内部，它们又是一种与右翼势力相抗衡的左翼力量。苏联党迫于国内的困难，只要他们还真正想坚持社会主义阵地，就必然要与中国党加强联系和合作。目前，这种接近的趋势正在加强。其他一些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也有与中国接近的趋势。相反，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党与中国和其他一些党却拉大了彼此距离。

第三，国际共运遇到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的挑战。如何认识当代世界的性质、特点、总体格局和发展趋势？如何加速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要求？如何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使社会主义焕发出活力和动力？如何搞好社会主义改革，建立起良性运行的经济、政治等体制？等等。这些都是关系国际共运命运的基本问题。此外，国际共运中长期争论的无产阶级专政、党的先锋队性质、民主集中制、革命道路、所有制形式等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更加尖锐。围绕着这一系列问题，各国党都在进行反思、探索。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已成为当前国际共运的一个重要特点。从根本上说，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现实相结合，科学地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才能使国际共运走出困境，出现新的高涨。

第四，国际共运内部的动荡局势尚未结束，但目前已由前一阶段的直线下滑趋势转为两种趋势并存的状态。即，一方面，有的国家内部斗争激烈，局势很不明朗，如果找不到解决危机的出路，形势可能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许多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和力量，在顶过了最猛烈的冲击波后，正开始吸取教训，聚集力量，为捍卫社会主义的价值而斗争，国际共运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反弹。东欧国家的党和人民也在尝试以新的形式进行斗争。

第五，中国党在国际共运中处于更加突出的地位。1989年北京风波后，中国党曾受到不少党的指责，一度处境艰难。但东欧剧变和苏联危机加剧后，中国国内的稳定恰与之成鲜明的对照。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为许多党和许多国家、许多人士所赞赏和羡慕。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把社会主义的命运与中国联系了起来。因此，中国党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增强，影响扩大，人们寄予的希望也更大。

面对这种复杂的新形势，如何处理党际关系，成为我们党需要回答的一个紧迫课题。70年来，我党在处理党际关系上积累的丰富经验，对于指导当前的现实，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并根据当前形势的特点，我们认为，处理党际关系时，在战略策略上，目前应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要冷静观察局势。无论在国际政治领域，还是在国际共运领域，局势都还处在变动中。旧的格局打破了，新的秩序尚未建立。在这种过渡时期，存在着许多不确定和不稳定的因素。因此，我们宜保持谨慎的态度，稳妥行事，不要四面出击。

第二，要继续立足于把自己国内的事情办好。当前中国在上世界上处于突出的地位，既逢机遇，又遇挑战。能否把中国的社会主义搞好，特别是把经济搞上去，不仅关系我们党

的命运和民族的盛亡兴衰，而且关系到能否在世界上树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成功范例，从而扭转社会主义下滑趋势，振兴世界社会主义。因此，要在当前的国际条件下有所作为，对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事业有所贡献，关键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特别是把改革开放搞好，把经济搞好。

第三，要适应新的形势，全方位地发展对外党际关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的对外联络工作已经不限于国际共运的范围内部。在新的形势下，更需要进一步拓宽交往面。既要与共产主义政党发展关系，也要与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工党发展关系；既要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发展关系，也要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党发展关系；既要与执政党发展关系，也要与非执政党发展关系。总之，要尽量多交朋友，少结冤家，以争取对我最有利的国际环境，避免人为孤立。当然，这种交往要有一定的原则，要按照不同对象，区别不同类型，采取不同渠道和方式，在不同的层次、级别和领域进行，内外有别，亲疏适宜。既是全方位的，又是多层次、多形式的。

第四，要正确处理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一方面，坚持原则，划清界限，对广大干部和党员、群众加强教育，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的干扰；另一方面，要尊重别国党和人民的选择，不要搞大批判，不要公开论战。别人的是非曲折由他们自己去检验和认识。我们不干涉别国党的内部事务，也不利用党的关系去干涉别国内政。我们与某些党在一些问题上有不同看法，但在他们处于困难和摇摆的时刻，我们应着眼于拉，而不是着眼于推。要从世界战略全局的高度考虑问题。

第五，调整对东欧国家政党的关系。（略）

第六，在坚持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前提下，也要适当地对国际共运施加一些积极的影响。如，正面阐述和宣传我党对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的立场、观点，介绍和传播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经验，交流加强党的建设的措施和经验，内部对国际共运的一些重大问题交流看法，采取一些适当而又必要的合作措施，通过政府与政府的渠道提供适当的经济援助，等等。如果尽我们所能帮助一些党和国家渡过难关，促进社会主义在国际上的复兴，那么反过来对我们自己也是有利的。